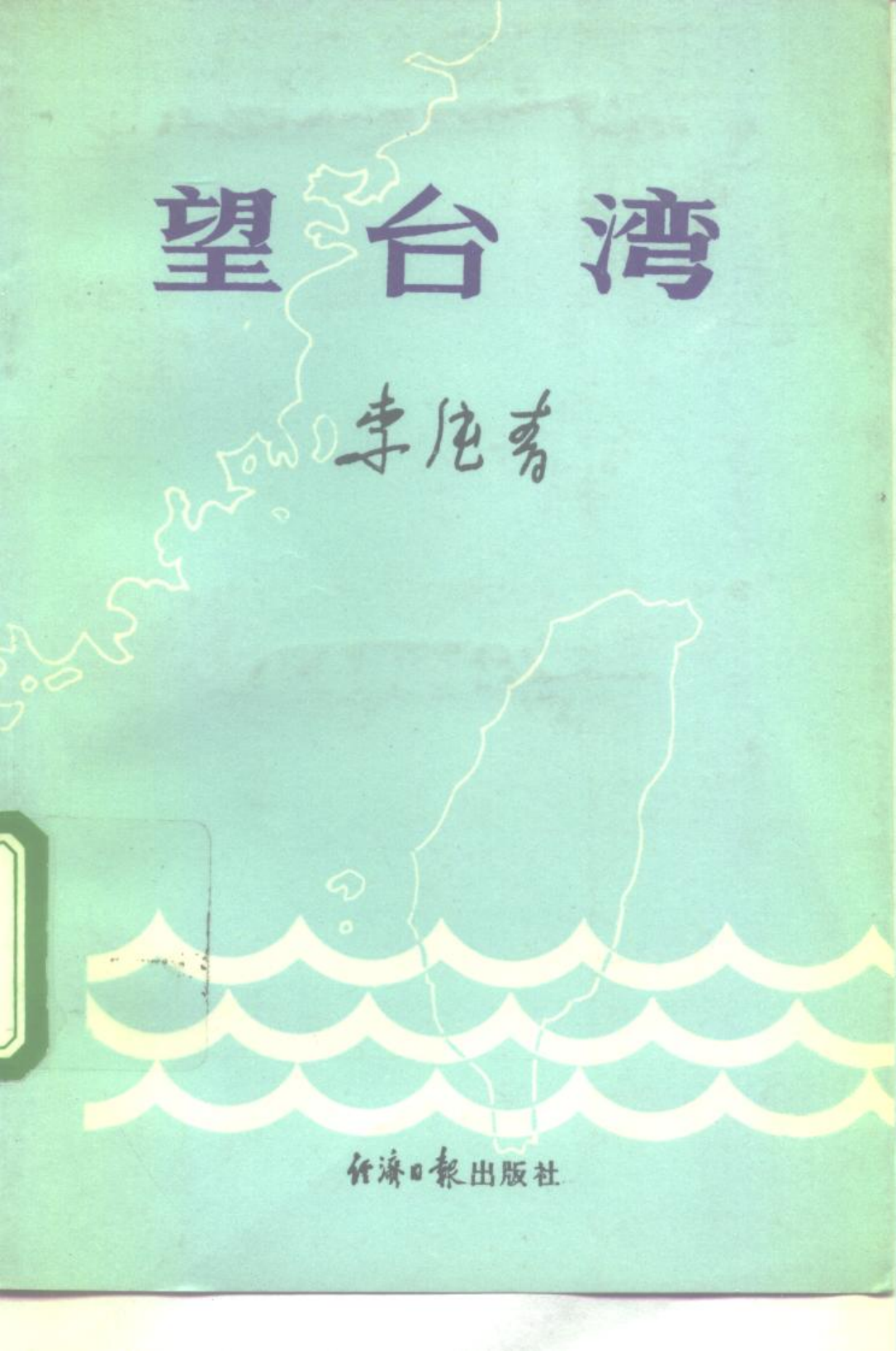


望台灣



李元亨

經濟日報出版社

望 台 湾

李纯青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子清

责任校对:蔺惠民

望 台 湾
WANG TAI WAN
李纯青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宣武区福州馆前街6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8印张 175千字

1991年6月第一版 199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0036-372-4/G·86 定价:5元

绪 言

(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

直到今天才整辑旧作，并补写了一部分想说的新语，实在太迟、太迟了。

蹉跎掉二十多年的岁月。

这其间沧桑变化，感慨系之。与我同时代的台湾人，已寥若晨星。偶尔在梦中相见，相对偶语，也是白头宫女话开元间故事。与第二代第三代的台湾人相见，代沟越来越深邃多歧。不难想像，读我五十年来所写文章，当味如嚼蜡。

旧作与新语一同问世，其目的有二：一是反映近半世纪间台湾问题的演变过程。二是提供研究我国对台政策的若干线索。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小册子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

这里收集了六十多篇文章，从抗战期间开始。在抗战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清朝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国际公认。当时主张台湾独立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的要求独立，即要求脱离日本，脱离殖民地地位。“七七事变”开始以后，中日两国实际处于战争状态，从政治上说，台湾人民应与祖国并肩作战，义无反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宣布废除与三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在法律上，《马关条约》已经废除，台湾应该归还中国。但在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却在觊觎台湾。一九四三年一月至五月，我写了反驳美国计划占有台湾的文章。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在大陆的台胞各政治

团体联合组织的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发表宣言,要求台湾归宗中国。我参加过这个宣言的起草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个宣言以后得到苏联同意。宣言明白指出:台湾本来是中国领土,被日本“所窃取”,日本战败后,“应归还中国”。据悉,开始讨论时,丘吉尔持异议。如果说,《开罗宣言》只是一种政治意图,那么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公布的联合国国家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更堂堂正正昭示这一定义,这个公告于同年八月十日为日本所接受,毫无疑问,它已为战胜国与战败国共同承认,具有国际条约的效力。

《波茨坦公告》第八段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那就是满洲(即我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这是不容讨论的国际条约。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按照规定履行《波茨坦公告》条件,十月二十五日,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代表日本政府在台北公会堂签字投降,将台湾归还中国。当晚,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陈仪,即向全世界广播:台湾已正式归入中国版图。

这本小册子收入了台湾光复时我作为新闻记者所写的一些通讯。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

当年,我在台湾见到各界人士,走在群众中间,沿西海岸由台北到东港,访问全岛。我也与老台共——即台湾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重要人物,多次接触。我曾告诉他们:台湾光复了,目前大家兴高采烈,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很

快地便会失望,从台湾历史和人民性格推断,接下去人民将起来反抗。不过,我并没有预料到“二·二八”事件会发生得那么快,会有那么大的规模。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一个重雾轻寒的早晨,三架美国运输机,从重庆九龙坡展翅起飞。中途在上海午餐。下午五时抵达台北松山机场。三架运输机运载了台湾省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人员,是到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为首的是秘书长葛敬恩。台湾人中有黄朝琴、李万居、宋斐如、张邦杰等。还有由重庆各报纸派出的首批记者。因为我与台湾的关系,我是作为《大公报》记者参加这次采访的。

我出生在福建省安溪县,福建台湾两地都有家。我祖父、伯父、叔父和父亲都是台湾籍。我不愿做日本臣民,拒绝申请台湾籍。我家三代做茶叶生意,家住台北市大稻埕下奎府町,那条小街老名叫朝东街。幼失慈母的我,在台湾度过童年。以后来回于海峡两岸,两边居住。最后一次告别台湾去日本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七七事变”后,我从日本回国,进《大公报》从事新闻工作,父亲属台湾籍不许离开台湾。抗战时期,父子间音尘尽绝。当我从重庆飞抵台湾时,骨肉离散已经九年。我不知父亲生活何状。他也不知道我生死存亡。我回到台湾是寻根,从我的长辈来说,我的远祖叫李邴,山东巨野人。据《巨野县志》第十二卷《人物志》记载,李邴是北宋末季崇宁五年(一一〇六年)进士,随南宋高宗南渡临安,辗转入闽,卒于泉州。其子孙繁衍,有一支卜居安溪。

命运给我极为残酷的安排。就在我回到台北的那天早晨,我父亲溘然逝世。当飞机降临,已达黄昏时分,我到朝东街家里,只见父亲的遗体,得不到一面诀别之缘。第二天,葬

父于台北郊区芳兰，纸灰飞舞，乌鸦盘旋，亲友相送者数人。天色和我的心同样的昏暗。

一九四六年秋，一位知名的台湾人士，我的朋友，到上海问我大陆内战形势。我说，国民党在大陆军事将全部溃败。他又问：“那么台湾呢？”我答：“那要看美国的态度。”他说：“我懂了。”

想不到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后，台湾与祖国大陆竟然分离四十年于今。我再也没有遇见这位朋友，杯酒论天下事已不可再，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这本小册子，主要收集了在大陆与台湾分离四十年间我陆续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章。

“二·二八事变”时，我正在上海《大公报》工作，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和吴思汉在一起，静听台湾电台和陕北电台广播。我们对起义情况都不了解。这里收入的两篇文章是根据李万居给我寄来的报纸写的。当时国内战争白热化，全国各地都在发生不同情况的民变。国民党正准备对人民进行屠杀，杀戒已开。他们在台湾镇压的借口有二，一是有“奸党”，即共产党；一是有叛徒，即反叛祖国。在国民党看来，杀这两种人是“合法合理”的。我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屠杀台湾人民的两种借口，以笔为矛，进行反击。

个人的认识，随时日而逐渐深化，见于历年纪念“二·二八”所作之文。

在此之前，由刘启光集资，苏新主编，在台湾出版《台湾评论》杂志，我挂名当总编辑，而人在上海，尽义务地从上海剪寄大陆进步杂志的一些论著，那就是所谓“文摘”之类。有时我也动笔写一点短文，介绍大陆情况。这个杂志没出几期，便被

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查封。我曾托人质问陈仪，陈仪回话说：“你的文章说新四军都是好人，问题就出在那个‘都’字。如果你说新四军也有好人，就可以无事。”如今《台湾评论》杂志在大陆已经找不到了。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二日，我正式参加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过去，我和它没有组织关系，只有工作上的协助关系和一些往来的朋友关系。我长期做新闻工作，从未想过要加入民主党派，也很不习惯于党政工作。

同年八月六日，我代表台盟去北戴河参加协商会议，讨论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八月二十二日，在京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解放台湾宣言》，我代表台盟在宣言书上签字，并讲了话。讲话未公开发表，底稿无存。

我在台盟只是兼职，一九五四年以前，主要工作都在台盟以外。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台盟主席是谢雪红，我代表台盟在外活动，到一九五八年为止。一九五九年以后十八年，我和台盟没有任何往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民主党派恢复活动，我负责台盟工作两个月，以后台盟主席就是蔡啸，接着又是苏子衡，我从旁协助。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盟换届，我退居第二线。我说这么一大堆历史，不是要推卸责任，当然更不可能是邀功。只是为了使读者明了这本小册子各篇的时间背景、来龙去脉。换言之，这里收集的文章只有一小部分是代表台盟的，其余都属于我个人的见解。

在此应该补叙几句。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受到冲击，住过牛棚，被抄家两次，被专政有年。但是我，——应该说我们，千千万万受冲击的人，包括对党和国家有过丰功伟绩的老同志，除林彪一家外，没有一个人逃亡外国。据我所知，有几个

著名党外“右派”，请他们随心所欲去国外生活，回答是：“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也要死在中国。”正如外国谚语所说：“不论正确与否，毕竟这是我的祖国。”文革为祸最烈的内蒙，也没有一个成吉思汗的子孙出走国外。这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不管遭受多么深重的灾难，只要还活着，始终要为国家鞠躬尽瘁。

如果不发生朝鲜战争，祖国早已统一。由于历史的嘲弄，国民党侥幸在台湾苟延残喘，依靠美国庇护，生存下来。从杜鲁门声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遮断台湾海峡起，经过三年朝鲜战争，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这一系列的重大历史演变，遂使台湾由内战问题加上了国际斗争问题。即欲解决台湾问题，既要与国民党斗争，又要与外来者作斗争。问题才变得如此复杂和艰巨。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不管语言怎样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三十多年前就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了。读者可以在这本小册子里找到对台政策变化的一些隐隐脉络。

非常遗憾，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在这本小册子上表现为空白。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说清楚一点，我受到错误的打击处分，我和当年一些误国误民的政治运动紧密相连，但并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不能不搁下笔来，无声无息，无所作为。时间在我身上停滞了二十多年。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美建交，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

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叶剑英委员长谈话提出九条具体政策，为国共谈判基础。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在此以后，为了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对国民党的揭露批评大为减少。

当台湾岛上的人民受到统治者残酷镇压时，我总是不能缄默，我有同样的痛苦和愤怒。例如高雄事件发生后，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过强烈谴责的文章。

这本小册子所集辑的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我知道，这些东西卑之无甚高论，但此心耿耿，确实曾为台湾回归祖国，为台湾人民的利益，竭尽绵薄，呐喊了数十年。因此把它题名为《望台湾》。

现在看来，当年写的这些文字，浅陋琐碎，不成体统，未尽欲言。我正在搜集材料，准备另写一本比较系统的书。愿天假我以年，了却我的心愿和义务。

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

大风之夜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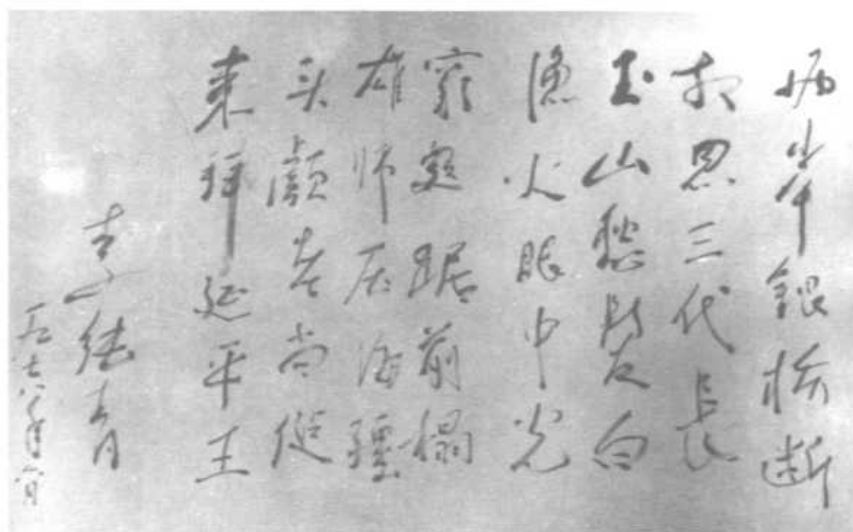
◀:作者(左)在日本东京向华侨总会赠礼(一九八四年七月)。

▼:作者与台湾前省议长李万居之哲嗣在北京合影。



作者简介

李纯青(1908—1990),籍贯台湾台北。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1937年起从事新闻工作,长期在《大公报》撰写社评和专论,研究台湾、日本等问题。出版有《日本问题概论》等专著,是海内外知名政论家。四十年代在重庆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而奋斗。日本投降后第一批由重庆回台参加光复典礼,是目睹台湾光复情况的见证人之一,并在台出版《献曝》一书。他为台湾人民的利益,为统一祖国,挥笔战斗,数十年如一日。本书是作者半世纪来为台湾人民说话的记录,也是台湾问题演变史的一个侧面记载。



作者墨迹 一九七八年为厦门郑成功纪念馆题词

目 录

绪 言	(1)
-----	-----

四 十 年 代

中国必收复台湾

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	(3)
------------	-----

再论关于台湾问题

读《美国的战后设计》	(7)
马关条约五十年感言	(11)
对国际托管制的见解	(14)
台湾问题发微	(17)

台湾光复采访录

台北散记	(20)
在爱国热潮中访问台湾全岛	(26)
米仓闹米荒	(36)
残破的工矿业	(40)
台湾的将来	(44)
认识台湾同胞	(48)
台湾产业资本概况	(51)
拾遗	(57)
(补白)台湾革命同盟会	(59)
给台湾参政员	(61)

抗议日警枪杀我同胞	(64)
涩谷事件到底是什么原因	(67)
惊闻“二·二八”惨案	(70)
台湾民变真相钩沉	(73)

五 十 年 代

驳斥关于台湾问题的谬论	(81)
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85)
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88)
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八周年	(91)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上的发言	(95)
还我台湾	
——纪念中国在台湾受降十周年	(99)
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105)
纪念“二·二八”起义十周年	(110)
〔补白〕悼宋斐如	(113)

七 十 年 代

我参加了欢迎会	
第一次讲话	(117)
第二次讲话	(123)
台盟代表大会侧记	(128)
〔补白〕步甘文芳先生韵	(134)

八 十 年 代

八十年代第一天	(137)
向台湾当局说几句话	(140)
纪念钟理和	
——在纪念钟理和座谈会上的发言	(145)
政治学北京	(147)
西藏和台湾	(151)
欢迎黄植诚	(153)
试论台湾经济	(155)
台湾工业的发展	
——再论台湾经济	(160)
促进和谈早日实现	(165)
〔附录〕叶剑英委员长九条建议	(166)
无法投递的讣文	
——悼念台湾老人苏新	(167)
光辉的史页	
——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周年	(170)
纪念台湾光复节	(173)
台湾老人又弱一个	
——悼念陈文彬先生	(176)
《阮台湾》歌谣集序	(180)
欢迎里根总统	(183)
漫谈有关台湾问题	(186)

昆明杂感	(192)
经济体制改革与祖国统一	(196)
可休的争论	(199)
无名英雄之碑	(202)
乡关何处是	(207)
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09)
在首都各界纪念台湾光复四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211)
在纪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表三十周年座谈 会上的讲话	(213)
序《历史的见证》	(216)
郑成功的历史地位	(220)
统一和对话	(230)
谈祖国统一问题	(232)
彩云归 ——从“返乡探亲”谈起	(234)
我的发言 ——纪念“二·二八”四十周年	(238)
寄语台湾领导人	(242)
〔补白〕本土化趋势	(243)
中国文化琐谈	(245)
《当代台湾企业家》序	(251)

四 十 年 代